



中国从夏朝到清朝，对贪官最狠、惩治最凶的统治者，莫过于出身寒微、曾经讨饭三年的朱元璋。在他眼里，只要为官清廉，犯了罪也可以得到减免；若是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能放过。集中查处窝案和实施酷刑是朱元璋惩贪的两大特色。

所谓窝案，就是团伙作案。朱元璋喜欢对贪官进行声势浩大、批量式的集中清洗。如胡惟庸一案，诛杀了三万多人；蓝玉一案（此案和胡惟庸一案既有经济贪污成分，也有政治结党因素），诛杀了两万多人；空印案和郭桓案连坐被杀的达七八万人之多。朱元璋亲自下令，所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顺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

对贪官实施剥皮实草等酷刑是朱元璋治贪的一大特色。《大明律》本业已有大量惩治贪污的规定，但朱元璋仍然觉得意犹未尽，亲自编写了相当于特别法（效力高于《大明律》）的《大诰》。《大诰》规定，贪污钱财 60 两银子以上者，处以剥皮实草的酷刑。各府、州、县和区所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行刑的场所，人称剥皮庙，又叫皮场庙。贪官被押到那里，砍下脑袋，挂到旗杆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进稻草，分别放进皮场庙和摆到衙门公座的旁边。新官上任，第一天要到皮场庙参观并在那里住上一夜，接受警示教育。除了剥皮实草之外，还有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刺指、断手、刖足、抽肠、刷洗、称竿、刺、割鼻子、阉割、枭首、凌迟、族诛等酷刑。后来，朱元璋觉得贪官越来越多，干脆下令：“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

尽管朱元璋治贪无所不用其极，但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本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夕犯！”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官吏俸禄过少。二是惩贪采用恐怖手段。

朱元璋有个习惯，在地方主要官员上任之前，他总要对他们进行一次诫勉谈话，讲讲怎样正确地看待俸禄的微薄和顶住贪污受贿的诱惑。他说，太太平平地拿着自己不算很高的俸禄过日子，

就好像守望井底之泉。井水虽然不会溢出，却可以每天都有水吃，因为泉水不会干涸。往深处想一想，贪污受贿来的身外之物真的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吗？你巧取豪夺，难免民怨神怒，再高明的计谋也是纸里包不住火炭。一旦东窗事发，你首先要被投入大牢受刑。判决之后再被发配他乡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赃物在何处呢？真的成了远在千里的身外之物，多数到了别人之手，你这时花不着、用不着，家破人亡，因此，贪污受贿来的钱财实际上对你不是福，而是祸呀！

如此利害分析也算情理并茂了，但明代官员的俸禄也太薄了，例如，明代的正五品官，岁禄只有 192 石，仅是唐代五品官俸禄的十分之二三，只比汉代最低一级的官员多了 92 石。明朝官俸形式亦以米、麦、钞兼支。由于钱价的日跌，粮价的日涨，更使俸禄无形之中降低了许多。到了明中期，一个正一品的官员，一年的俸禄 1044 石，折成银子仅约 300 余两，抵不上京师一个富家子弟三个月的花销。职位卑微的下层官吏，本折兼支的结果，实际到手的俸禄就更少了，难以支付一家人日常的生活费用。于是，一批官吏便不惜以身试法，贪污受贿了。这再次印证了“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朴实道理。

朱元璋反贪的坚定性固然可佩，但他的反贪手段大有问题。他把搞出赃罪的多少作为考核官吏的一条标准，导致许多司法官员对案犯大搞刑讯逼供，“以赶上意”。由于诛戮过甚，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员，从洪武元年到十九年春季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结束的，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来不及补充，没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叫判刑后的犯罪官吏，戴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另外，朱元璋办案不讲程序，喜欢越俎代庖，直接定人生死，感情用事，高下由心，很多冤案由此而生。更有一些人，看到当官随时都有被诛杀判刑的可能，认为反正动辄得咎，朝不保夕，不如趁早捞一把算了，反而加紧贪污受贿活动。

看来，反贪污贪不能用恐怖手段，不能用人治运作。贪污受贿是暗箱操作，反贪污贪却要在民主的阳光下进行。

2006 年底，经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协助，找回了 1641 年意大利潘国光神父为徐光启葬礼写的一段拉丁文和 1903 年江南天主教纪念徐光启入教 300 年时写下的一段拉丁文。徐汇区文化局多方查证，确认后在今年国庆前夕镌刻在徐光启墓前十字架基座面南的两块汉白玉上。消息传出，引来了众多参观者，徐光启墓志铭的再现，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

徐光启墓是 1988 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2003 年，徐汇区按照 1903 年的墓地原貌对徐光启墓进行了全面修复。但十字架基座面南两块汉白玉上的拉丁文字和徐光启墓前的中文碑文阙如。尽管当时花了大量精力，查遍各类图书馆和档案馆却都毫无结果，遗憾地留下空白。

几年来，我们一直留心寻找汉白玉上的拉丁文字，李教授也一直记在心上。他或在网上搜索、或到藏书楼翻阅、或在图书馆查找，都没有结果。一次偶然的机

第一次见陈导，全拜秋微的引荐，而我是哆嗦着去的。百分之一是激动，百分之九十九是害怕。

早有传言她酷似“穿 Prada 的女魔头”，严厉苛刻，能坚持下来的，都是战士，坚持不下来的，便是烈士。

出乎意料，一顿简单午餐，她笑着，和蔼地看着我吃。那笑容，温柔无比，春天一般，也更令我如坐针毡。面

创作伊始，是头脑激荡的时间。我们要想办法把洋洋几十万言的《红楼梦》凝炼成两个小时的剧

寻找散失的徐光启墓志铭

宋浩杰

帮助寻找，因为那时徐家汇的史料，经常在国外刊物上发表，像徐光启这样在中西文化会通中起主要作用的著名人物，海外多有记载。

去年，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主任钟鸣旦教授到上海访问，我和李教授陪同钟教授参观了徐光启墓地和徐光启纪念馆。临别时，李教授郑重委托他寻找相关史料。不久，钟教授的同事杜鼎克教授也来到上海。杜教授是研究中国明清历史的著名专家，对于喧闹的徐家汇还保存着一块明代胜迹非常兴奋，回国后和钟教授一起到处查找，终于在 一本 20 世纪初出版的西班牙杂志上发现刊有拉丁文的徐光启墓志铭，在因特网上发给李教授，李教授如获至宝，迅即将此文传给我。今年 2 月，我和李教授等人持墓志铭拜访上海教区金鲁贤主教，同时还请教了澳门耶稣会的高照明神父进行咨询。高神父是法国人，经他们确认，我们手中的墓志

铭就是徐光启墓前十字架上的拉丁文字。

十字架左边的拉丁文墓志铭大意是：献给中国伟大学者徐光启的；徐光启因成为中国皇帝的注意和自己的努力成为中国所有的显要人物中举世无双的人；整个耶稣会为了表示感谢和爱慕建立了这座纪念碑。右边的汉白玉上拉丁文字大意是：墓志铭是潘国光神父 1641 年奉献给徐光启的；1903 年，为了纪念徐光启入教第 300 年，竖立了这座十字架；还有其它一些文字等等。

近日，我们又将拉丁文墓志铭与 2002 年在光启公园勘探时发现的刻有拉丁文字的石碑进行对照，除残缺部分文字无法确认外，其余文字基本相同，从而也证明了这块石碑就是徐光启在 1641 年下葬时竖在墓前的墓碑。

目前，还剩下最后的遗憾：1641 年徐光启下葬时墓碑上的中文碑文还未找到，在此向全世界悬赏征集。

明请读一篇《纪录片<徐光启>散记》。

的悲剧处理。

这座城也是博爱的，她爱生活，她会教你如何着装，如何打扮得光鲜亮丽；她教会了笨拙的我如何把搅拌咖啡这样简单的动作做得优雅；她也会亲自下厨给你做一大碗甘蓝臊子面。师太喜欢汤显祖，喜欢莎士比亚，喜欢贝多芬，她赞美的自由是人类最大的自由，所以她常会向大家隆重介绍舞美常疆和王晶，“他们是一对恋人！”引来一片赞叹之声。

这座城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她好像永远年轻，永远有好奇心。和师太一起，你要时刻准备着回答各种奇怪的问题。她也永远不会重复自己，所以也只有她敢把《红楼梦》搬上话剧舞台，搬进万人体育场。而且特别奇怪的是，她身边总会聚集一大群年轻人——与师太英雄所见略同的总策划姚博文，演谁像谁的副导演贺炬，编剧才女秋微，前面提到过的小倩侣舞美王晶和常疆，才华横溢的舞蹈家黄豆豆，“不打不相识”的张肇达，舞台监督杨光等人，严格按艺术家要求的音响师朱江，场记小汪……对此师太说得是恳切之至：“我不敢想象，如果我不跟年轻人在一起，不知道我自己会落伍到何种程度。”这座春城，人见人爱。

陈万里与我祖父的友情

叶放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陶瓷界，谁人不知陈万里。陈万里的英名第一次进入我的视听，是半个世纪前，那是 1953 年，我才九岁，祖父叶正生来到龙泉城里我父亲处养病，与我朝夕相处近一年。我常在祖父的膝下听故事。祖父给我讲了许多大窑青瓷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是与陈万里一起寻访龙泉哥窑遗址。

我的祖父系大窑村民，但幼年读过私塾，青年时在德国传教士奔德牧师门下听差。1928 年至 1941 年的十四年间，我国青瓷研究的拓荒者陈万里先后九次赴龙泉，八次去大窑实地考察，七次侨居我祖父家，并聘我祖父为向导，为他日后的青瓷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所著《青瓷之调查与研究》一书，是在祖父家客房里写成的，在《陈万里日记》和《瓷器与浙江》等书中多处提及与祖父的友谊。

1934 年 10 月 4 日《陈万里日记》里写道：“五里到大窑，时正十一点半，晤见叶正生先生，系由郭先生所介绍。他正在那里讲道，听众有男女小孩二十人左右，就在他家里的正屋。移时会散，遂与寒暄，即留住于此。”

陈万里造访大窑祖父的家，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竟有六次之多，分别是 1939 年 1 月、1939 年 5 月、1939 年 6 月、1940 年 1 月、1940 年 7 月、1941 年 9 月，为破解哥窑谜案。1939 年陈万里来到大窑，是为探访大窑新发现的窑底遗址，希望寻觅到哥窑的遗迹，虽无功而返，但他第一次接触大窑窑底出土的黑胎类哥窑瓷片。

陈万里是公务人员，业余做考古，自然缺少资金购买精美的标本。为支持陈万里破解哥

窑谜案，我的祖父不惜拿出自己的珍藏供其研究。他记录了此事：“叶家与我碎片若干，其一，系盘底，釉未显出，底足规矩异常，呈黑色，碎片胎骨亦是黑色，与两面未曾显出之白色釉相夹，宛然一片夹酿豆沙的饼干……”陈万里就凭这些精美的黑胎瓷片，写出《龙泉大窑之新发现》一文，轰动陶瓷界。

有一次祖父刚购得两件所谓黑胎底物品，还邀陈万里赶到大窑考证。陈万里最后一次到大窑是 1941 年 9 月 20 日，祖父患了疟疾，幸亏陈万里随身带有奎宁，祖父饭后当日就好。祖父表达八年来所结下的友情，几乎倾其心爱之物赠送陈万里。



钢笔画 嘉定古猗园 杨秉辉 画

古猗园在嘉定区南翔镇内，建于明嘉靖年间。1937 年淞沪抗战时毁于战火，1959 年重建，1983 年又扩建成今日之规模。园中有一补阙亭，此亭方形，然独缺东北一角，是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地方人士不忘东北国土沦丧之耻所建。今成历史遗迹。园内有湖心亭、九曲桥、荷花池、鹅池、松鹤园等景点，为上海市郊著名古典园林。

陈万里此次离开大窑后，不久调离浙江，赴陪都重庆任职。1941 年陈万里的《瓷器与浙江》出版，祖父收到了他寄自重庆的新书，如获至宝。解放初期，陈万里在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时，也时有书信问候祖父。1954 年祖父病故时，他还致唁电慰问。可惜这些书信连同陈万里与祖父的合影，都因“文革”烧毁。陈万里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遗骨未存。

今年是陈万里诞辰 115 周年，我重返故里，来到祖父光绪末年建成的那座百年老屋，瞻仰了陈万里当年寄宿过的卧室，70 年前他伏案写作的那张办公桌，依旧完好保存着，令人感慨万千。

去年的 11 月 11 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奶奶的离去给这个寒冷的日子又添加了些许寒意。那天，我第一次那么真切地感受到了失去亲人的痛。

奶奶一直是个坚强的人。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们能够放心地生活，她总是表现得很乐观。无论治疗多么痛苦，药多么令人作呕，她总是默默地独自承受着，面对家人，她总是努力露出笑容。大家总以为她的病就能这样慢慢地好起来。直到有一天，奶奶走着走着突然就倒了下去，原来猖狂病魔已经蛀空了奶奶的骨头。医生说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病人一定已经承受了很漫长的疼痛过程了。而生活在奶奶身边的我们却不曾察觉到……

我不由怀念起那些奶奶和我们一起快

乐过的日子。小学的时候，我每个星期总会去奶奶家吃一次饭。奶奶看到孙女的时候那种慈爱的笑容，她家那一进门就能闻到的香气四溢的红烧肉味，让我把“奶奶家”与“温馨”联系在了一起。

病危的奶奶再次住进了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奶奶，我却是惊恐地想着奶奶无法再下床了，无法再用那双灵巧的手织出一幅幅好看的十字绣了。不由落下了眼泪。奶奶却突然笑了，虽是笑了，但眉头还是紧紧地皱着。终于这个日子还是来了，心仿佛被掏空了一般。

儿时的一段对话浮现了出来——“舒舒，你长大后赚了钱要怎么花啊？”“我要买一幢像东方明珠一样高的房子让奶奶住，还要买一辆法拉利带着奶奶去兜风！”

